

我的四位美育老师

唐 韧

中考要考音乐和艺术,据说已成定局。现在凡对一科目表示看重,标志就是动用考试这法器倒逼学科发展。这也算时代特色了。上个世纪,即使上溯到解放前,升高中曾考过音乐美术吗?是一直不重视美育,还是另有缘故?

窃以为这两科的水平实在难用考试衡量,与上高中的资格挂钩也不甚妥当。我认识一个女孩子,歌一首也唱不明白(五音不全),但其他各科优秀,你能说她念不好高中吗?孩子们的爱好和天赋相差甚远,老天降人才既不拘一格,凡间选拔人才又何必这么面面俱到呢?

这让我想起自己经历的美育(我1951年上小学,1960年初中毕业,高中就没有音乐美术课了),同时也想念起我的老师们来了。

我的第一位音乐先生姓陈,是才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年轻姑娘。圆圆的苹果脸,亮眼睛,人挺苗条,常穿一件嫩绿的毛衣。她走进音乐教室,微笑着,宛如春天本人走了进来。她教我们画五线谱里的“蜗牛”符号、“蝌蚪”符号,画着玩儿而已,不测验。跟着她的琴声唱哆来咪发嗦,也是玩。更快活的是跟着她大声唱:“快来吧,亲爱的五月,给树林穿上绿衣!”或者“驴子走进树林里,要跟布谷比本领”。那是1951年的一年级,不记得有没有正规的音乐课本。这些歌保存在我记忆里,至今仍完整唱出来。她教的时间不长,后来的音乐老师,反倒不记得了。

小学的美术先生是个半大老头,我们知道他叫王成,还是有一天看到教研室黑板上写着“王成有事,请假半日”,小孩们大约觉得这话有趣,念叨来念叨去,就记住了。他也会讲些知识,近大远小啊,三原色啊,但他最有成效的,也是让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布置美术日记。我们每人都有一个巴掌大的小本子,每天必须画点东西,画就行,画不好也不要紧。一间房子,一只鸟,一颗糖,一顶帽子,一棵树……随便。我画的经常是格林童话人物和小猫小狗之类,我同桌的日记,连同课本空白处,则每每画着各种青蛙,蹲的、跳的、捉虫的,再不就是戴着高加索皮帽子的苏联英雄夏伯阳,就这两样。他的父亲是有名的画家,曾送给我们班一张北海公园春游的画,一直挂在教室后墙的正中,甚受全班同学景仰。多年后在报上读到一篇关于我同桌的报道,称他为“部队小画家”。王先生的教法我曾用于教女儿,一个暑假就画了一本,她喜欢画动物植物,长大学生物,画的植物图甚得老师赞许。

升入初中我可遇到了名师了。我的音乐先生米黎明,个子不高,宽胖身材,“共鸣器”长得很好,据说是北京“四大名唱”之一。她是女高音,歌声辽阔舒畅,听起来会想到电影里波浪起伏的海面。她在音乐教室唱,隔着一个大操场听,耳朵还有震感。

那时候我们学的歌,多是热血沸腾的抗日歌曲,和歌颂祖国新面貌的爱国歌曲。她给我们听洗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凄婉的《黄水谣》,高亢有力的《黄河船夫曲》,把全班分成两半唱《河边对口曲》,四部轮唱《保卫黄河》。米先生教唱歌从来就不用讲解,一首歌的情感该怎样表现,全在她歌声里。犹记初三毕业测验,唱的是洗星海的《在太行山上》,我们是怎样努力挺起经济困难时期发育缓慢的小胸脯,学着敬爱的米先生,尽量豪迈地唱出:“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又是如何效仿她那样深情和激动地(微微晃着头)唱出:“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

我们只是米先生的普通学生。她教我们那几年,曾辅导两个高中师姐进中央音乐学院。一个和她一样唱美声,另一个却是唱民歌的,考试时唱的是陕北民歌《绣金匾》。

米先生的音乐课最神奇之处是我很多年以后才会体会到的。我快70岁的时候,家里为外孙买了一架电子钢琴。那天我来了新鲜劲儿,坐在那儿把想起来的歌儿按了一首又一首。女婿诧异道:妈妈你不用看谱子吗?我说,会唱的歌儿当然就会谱子呀。他大为惊讶:妈妈你神了!我弹吉他必须先记谱!歌手大赛时好多唱得很好的选手都不会记谱!我这才知道,米先生教了我们一个大本事。一开始上的音乐课,我们就跟琴唱乐句,从各个声调的“啊——”到唱谱,逐渐学会了把比较长的乐段按高低长短用音符记在纸上,并标出是2/4拍、3/4拍或4/4、6/8拍。最后,初三毕业时,米先生要求我们找一首歌谣,自己配个曲子交给她看——这不就是作曲吗?不止我学会了,我们全班都学会了。

后来我教中学,这本事还派上了用场:虽然是语文老师,在长白山的矿山中学,我也能很轻松地教学校宣传队的孩子们唱新歌,用老歌填新词,甚至还自己作词作曲给他们写过好几首的歌,有一首朝鲜族风格的“泉水甜,林海宽,我爱祖国的长白山……”颇受欢迎,校庆文艺汇演之后,还经常听见学生们唱呢。

“不是我神”,我说,“是我的米先生神!”

但是除了结课测试,我们升高中并不考音乐。

教我初中美术的樊先生同样不是“凡品”,她是工笔花鸟画大师于非闇的关门弟子。她也按教材教西洋画法(石膏模型,人物头像这些),但最有趣的莫过于让我们跟着她在校园里写生,画墙根下的玉簪花和花圃里的玫瑰。樊先生告诉我们怎样用水彩颜料表现花瓣饱满的水分,着色时怎样用水逼真地刻画花瓣颜色的深浅变化,为什么要保留着色的笔痕……她还教过我们用复色技法画桃花,毛笔先吸

饱浓艳的粉色,再吸入少量清水稀释为浅粉,最后笔尖点上白色,在用铅笔轻轻勾了轮廓的花朵上,将白色对着花心,毛笔往下坐一下,由白而艳粉的一个花瓣就出来了,转圈画完,就是一朵(没骨的)桃花,很是生动。我当时热衷于学画,被选为美术科代表,梦想考中央美院附中,经常守在樊先生办公桌旁,看她怎样在上过矾的熟宣纸上用双钩法——淡墨画轮廓,着色后用浓墨或浓颜色在淡墨上再钩一轮廓——画工笔花卉,怎样在荷叶上画出透明的并且像是凸起欲流的露珠,又怎样用浓稠的颜料点出那些似乎是颤巍巍的花蕊,临摹叶浅予先生的舞蹈速写后,怎样改成工笔画,画出舞蹈的女孩子身上的轻盈的衣裙和飘带,点出她们亮晶晶的眼睛……那时候,我常在课间休息时俯在课桌上画画,还曾经像个美术专科生那样,背着画夹到学校附近的北海公园去写生。初中毕业时同学们送我的照片后面,许多都写着“送给我们班的小画家”。但是因为素描石膏像画砸了,我没考上美院附中,梦想就此中断。不过后来在中学教书和在公社文化站当站长,我都能为黑板报配上不错的插图和报头。学校美术老师缺人时,我还教过一个学期的初中美术。当我把自己从小人书上放大的杨子荣打虎上山钉在黑板上给学生示范时,学生们曾用极其热烈的掌声为我点赞。就是教中学语文,讲到朱

自清散文《绿》,我也能用彩色粉笔和学生一起画出作家游览梅雨潭时位置和视点的变化。

同样,我们初中毕业的美术成绩与高中录取没有任何关系。

当我回忆我这几位美育老师时,深感曾跟着他们学习是多么幸运。这幸运不仅在于当时的快乐,也不在于后来工作中,我曾用他们教的东西给学生带去帮助和快乐,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美的执着搔到我心中痒处,触动了我对美的向往和追求,这种触动无法用分数评判,却比一切知识技能更重要也更持久。或许可以说,美育的关键就在于这个“触动”。

追溯前面的话题,感想有二:

一是对考试能倒逼出什么样的美育发展有些担忧。如果初中毕业的孩子背会了乐理和美术基础知识,能唱课本上的歌,画课本规定的石膏球、多面体和头像,却不能从美育老师那里得到使他们兴奋,甚至沉醉其中的触动,或者让应试分走了美育老师们本应用于触动和点拨学生的精力,会不会得不偿失?

二是真正重视美育教育,就该聚焦于给孩子培养和挑选懂得美、有感染力、能帮助孩子们与美共鸣的高质量美育老师,让他们有尽情感受美和被美触动的幸运。无论他们后来做什么,哪怕他们五音不全或色盲,被美浸润心灵的感动都会长存。



放学路上(国画) 刘呈欣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 二维码

全球疫情袭来之后,所有的国际交流都转移到线上了,隔空和专家们问候、对话,艰难地完成年度任务,各种无奈。最难以克服的困难还是时差问题。一般由地理位置居中的欧洲人主持会议,(他们的)中午一开场就要求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专家首先发言,因为大洋洲那边已经星星点灯了,而阿根廷、哥斯达黎加等南美专家尚睡眼惺忪,他们的早晨刚刚开始。中国专家比大洋洲专家略强一点,但大部分会议依然持续到深夜,顶不住的话只能请求先行告退。一个审评周期下来——上午干本职工作,下午和晚上在线上参加集体工作——每个人都累惨了。苦中取乐,所有会议的最后环节都是各位专家集体打开摄像头,熟悉的笑脸如花般次第开放在屏幕上,飞吻、挥手,有的西服革履正襟危坐,有的便装素颜怀抱宠物,共同期盼不久能够线下相聚。

线上会议

小 黑

候,阿里总会带两大盒椰枣,我每每吃得欲罢不能。2020年下半年,当大家隔空开会的时候,屏幕前的他抽了抽鼻子,说,我好像有点问题……第二天,他又坐在屏幕前发布消息:yes,果然阳性了!

我一脸惊讶,本地能从屏幕前回缩了一下(幸亏当时没开镜头)。而其他专家都平静如水,连劝他别开会了,下线去医院或去休息都没有。就这样,阳性的阿里一直没有离开屏幕和工作。当然,他也是居家办公,一个人呆在书房里。等我们2021年年初又见面时,他已经完全恢复了。私下打听了一下,并没有去医院,就是自己在家呆了几天而已。

2021年初疫苗纷纷问世了,国内有科兴,国外有Pfizer-Biotech, Moderna, AstraZeneca, Johnson&Johnson

等。开会之前闲聊,一时之间注射疫苗成了热门话题。专家们大都说,还没打呢,目前优先60岁以上的老年人注射,我们正排队。一个年轻姑娘高兴地说,终于轮到奶奶了,开完会我就陪她去。

9月份,英国合作伙伴皮特发来邮件,说自己几个家庭成员测试阳性,要在家里自我封闭一段时间,也许回复邮件要慢一些。过了两三个星期,再开视频会议的时候,他出现了,风轻云淡地说已经痊愈。我好奇地询问主要症状,皮特说,头疼、流鼻涕、疲倦,有段时间头疼得挺厉害,幸亏我们都注射了疫苗——我们牛津的AstraZeneca防护效果很好的(皮特正是牛津大学的老师,有段时间疯传牛津疫苗有严重副作用)。旁边的法国专家插话说,他有几个学生也阳

了,症状不轻,类似重感冒,不过很快都转阴了。我一边听一边暗暗咋舌。

转眼到了2022年,线上会议继续进行。一贯快人快语的西班牙姑娘艾米丽哑着嗓子说,诸位,我阳性了,大约这次要保持沉默了。镜头里的艾米丽鼻尖红红的,一副随时流鼻涕的样子。这次我没有从镜头前撤回,但还是吃惊地“哦”了一声,眉毛忍不住跳动了一下。饶是这样,艾米丽一点没少说啊,一边抽鼻子一边发言。

看统计,新冠在这些国家的致死率并不特别低,但风险集中在老年人群体。我的这几个朋友都是年轻人,至多中年人,症状有轻有重,但都在短时间内痊愈了。但是我们失去了一个专家,德国的米歇尔,他已经退休了,但继续为国际组织工作。他确实比较胖,说话都有点喘,喝起啤酒来很有德国人的风范。今年3月份开会的时候,还看到他的名字出现在屏幕右侧的名单里,虽然没露脸。会后不久就收到了秘书处发来的讣告。不知是否与新冠相关,大家又震惊又伤感。

从6月份开始,国际会议开始尝试在线下召开了,但实际上参会人员大约只占一半,另外一半继续在线上参与讨论和工作。大约这种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将成为常态,我们很难完全回到2020年前的世界了。

今年五月,沪上一旧家所蓄英文书散出,我见其中有一册为文人、藏书家周越然(1885-1962)旧藏,便订下了。当时上海尚在岑寂之中,邮路未通,窃思此是何等微末之事,也未曾催问。过了半个多月,书居然寄来了。

这是常见的“人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中的一种:英国诗人、小说家查尔斯·金斯莱(Charles Kingsley)著《希腊英雄传》(The Heros)。是书写柏修斯、忒修斯等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事迹,叙事尚称简明,适合少年阅读。1955年儿童读物出版社就印行过吕天石的译本,近年的新译则不止一个。

1910年的这一版《希腊英雄传》,倒与寻常的“人人丛书”本略有不同,道林纸精印,所配插图亦精。书中未写插图为何人所绘,我查了后日本,已注明是T.H.Robinson画的。这位托马斯·希思·鲁宾逊(Thomas Heath Robinson)虽不如他同为插画家的兄弟查尔斯·鲁宾逊、威廉·希思·鲁宾逊有名,但据我看,他的画作却似更有品位些。他的男子身姿之矫健、女子体态之婀娜,都难得的不俗气,大片的黑色调用得尤其好。今年四月国内出版的《欧美插图黄金时期作品选》,选了查尔斯和威廉的画,而未选托马斯的,或许算遗珠之憾。

周越然在《希腊英雄传》上签的名是Tseu Yih Zan,若不熟悉他民国时期编篡的那些英文读物,是绝难从这个签名拼出“周越然”三个字的——我能轻易得到这册书也以此。周越然旧藏的线装古籍,近年拍卖会上每有出现,而他收藏的西文书却极少见,此前我只见过苏州的曹彬先生2016年购入的一册,是约翰·玛西的《世界文学史话》(The Story Of The World's Literature),上面的英文签名,笔迹与我买到的这册非常相似,连向上倾斜45度角都一般无二。不过,那册上有周越然的中文题识一句,更名贵些。《希腊英雄传》上另有一红色花押章,似是“ML”两个大写字母,疑为比周越然更早的书主人所钤。

周越然署的日期“21/4/28”,却令我一见即大呼头痛。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四种可能,难于遽断。按英国人的习惯,它应该是1928年4月21日,可那会儿的国人常用民国纪年,如民国二十八年也可以写“28”,因此,它也可能是1939年4月21日。此外,若书写者是按中国人的习惯顺序,它也可能是1921年4月28日,或循民国纪年,则是1932年4月28日。正在为判定日期犯难之际,我猛然想起曹彬先生购藏的《世界文学史话》上周越然的那句中文题识:“民国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购于上海二马路伊文思,实价四元。”Eureka!我像从澡堂子里一跃而出的阿基米德一样喊了句:我找到了!

为了解与此小问题有关的语境,且让我们先读一下周越然对其西文藏书罹厄的记述:

我第三次亡书,在民国二十一年(壬申)一·二八事变中。当时我家(动词用)闸北天通庵路,藏书的几间屋子叫做“言言斋”。炮火连天的时候,房屋不计外,我所损失的书籍总在三千种或五千册以上,其中五十余种,系绝版者或稀罕者。(《购买西书的回忆》)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攻打闸北,这是“一·二八事变”之始。周越然在《逃难记》一文回忆事变前后的经历,曾写道:“我的自建房屋,大概在二月八日与十六日间被焚——或为炮火,或为放火,原因至今不明。”不用说,这也是言言斋藏书的一次大厄。

我们回头看看周越然记在《世界文学史话》上的日期——1932年3月22日,此时距“一·二八事变”之起尚不足两月,也是周越然房舍、书籍俱被焚毁后的一个多月。按历史记载,1932年3月3日,中日双方停战;3月24日,在英领事举行正式停战会议,“一·二八事

周越然的英文藏书

刘 铮

变”才算尘埃落定。也就是说,当周越然在专售西籍的伊文思书店里淘书时,停战会议都还没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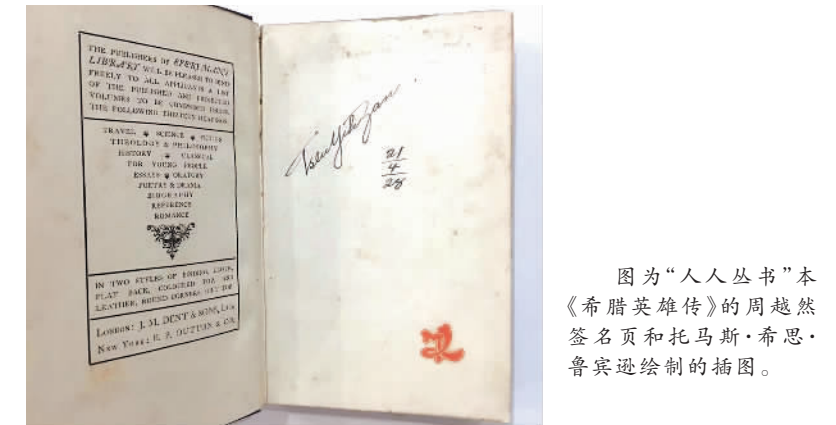
现在再看《希腊英雄传》上的“21/4/28”这一日期,实际上,只剩下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民国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在周越然购入《世界文学史话》的三十七天之后。两册书购买的日期非常接近,也很好解释了为何两个英文签名如此相似。

了解了周越然购书的背景,又令我们有可能进而理解周越然购书的动机。因为老实讲,《世界文学史话》也好,《希腊英雄传》也罢,对深嗜西文书的人来说,都只能说是极普通的书,且程度不高。那么,当时已经四十六七岁、读英文读了半辈子的周越然何以要买这样的书?原因很简单,就像他在《逃难记》里写的:“自己的房屋及其中一切,都被毁了。那么当然非重做人家不可。”嗜书人的“重做人家”,当然就是在战火硝烟渐次消散之际,便忙不迭地买起书来,而且是从头买起,哪怕是习见之书、通俗之书,也照样买、买、买。

周越然在写于1944年8月10日的《购买西书的回忆》中称,他所藏西书,“虽然已在一·二八时遭劫,但一·二八后补购的亦属不少。我家中现有者,总在一千五百种以上——大部分为文学书,足供我年老时的消遣。”换言之,在劫后的十二年间,周越然又购入超过一千五百种西书,也就意味着,平均每年买的西书达一百种以上。考虑到当时外文书价格颇高(“实价四元”即不便宜),能保持这个购入频率,足见周越然在藏书方面的嗜欲至老不衰。

既然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周越然的西文藏书又已达一千五百种之多,那为什么流传到今天、有周氏签名的西书却如此之少呢?我想到一种解释,那就是,或许周越然本无在西文书上写名字的习惯,而他之所以会在《世界文学史话》《希腊英雄传》上签名,只是因为那会儿的他,藏书份数、旧习难除,胸中对新得之物有价格外的珍惜罢。嗣后生活平静,新籍不断加添,也就不再有一题写名姓的兴致了,想亦是人情之常。

探究完书背后的种种,我轻抚着《希腊英雄传》的烫金书脊,似乎比之前更增了一份欢喜。毕竟,在炮火战乱、赏财俗俗、爱恨喧嚣之外,尚有一小片安静,可在书里觅得。读书人或因此而不难有异代相知之感。



图为“人人丛书”本《希腊英雄传》的周越然签名页和托马斯·希思·鲁宾逊绘制的插图。

